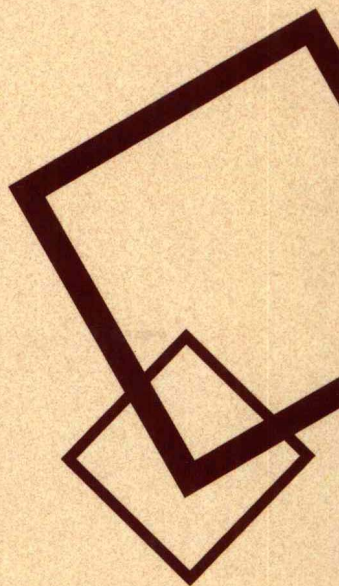


前 进 英 才 丛 书

北大教授与 《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路线图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New Youth"
Mapp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张耀杰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前 进 英 才 丛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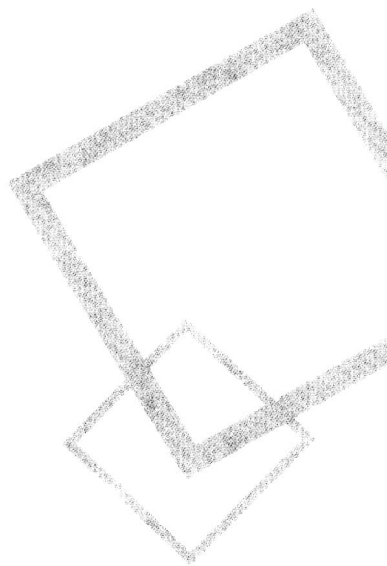
鲍林春前进英才基金资助出版

北大教授与 《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路线图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New Youth”

Mapp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张耀杰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张耀杰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 8
(前进英才丛书)
ISBN 978-7-80128-943-8

I. 北…

II. 张…

III. 期刊—文化史—中国—民国

IV. G2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761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 (发行部) 64963101 (邮 购)

64924880 (总编室) 64890042 (编辑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9.625 印张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ISBN 978-7-80128-943-8/K·102

前进英才

蒋正华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
蒋正华为“前进英才丛书”题词

序 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

张耀杰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前后写作了10多年，称得上是呕心沥血的学术著作，其中的大部分篇章曾经与我反复交流过，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谈一谈对于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看法，算是为这本书抛砖引玉。

2003年8月，为编写《大学人文教程》，我随朋友们去了屯溪，其中的一项安排是去绩溪上庄拜访胡适故居。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车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带的山道，一边是岭一边是溪，面对窗外不断移动的秀水青山，一车人都在慨叹：“难怪这里出了胡适！”

从胡适故居出来，正逢学校放学，我随意问路边的小学生胡适是谁，一连两次，谁知都望着我摇头不语。是不知道，还是有什么隐讳？我不解。真不知上庄人是怎么看待这位前辈乡贤的？

胡适，1891年出生，1962去世，享年71岁。19岁时（1910年）通过庚款考试，先后留学于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通过哲学博士的考试，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回国前夕，一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的《文学改良刍议》，使古老的中国发生了一场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化运动，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话语革命，也由此奠定了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的一句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然而，20世纪下半叶形势陡转，胡适的形象一落千丈。1950年代，中国大陆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

2 |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

是没有胡适的书可读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但是，尽管没有读过胡适，胡适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反面形象，记得“走狗”两个字庶几便是我脑海中对这个形象的最早勾勒。多年后，等到我自己开始通读《胡适文集》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过一个大大的“之”字。“文革”结束不久后的1980年代，中国大陆逐步对胡适重新评价，这是一个“去妖魔化”的过程。胡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逐步从学术领域过渡到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随着人们对胡适和胡适思想的深入认知，已经沉入历史背影中的胡适再度走向历史前台。当然，这里的“胡适”已不仅是他自己，而是某种精神的象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以及20世纪历史本身都留下辙迹的胡适，他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放在今天，我以为有这样一点——这也是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髓之一，那就是“宽容”。

什么是宽容？20世纪以来，就外来的宽容而言，宽容主要是靠当年留学英美的那一批知识分子输入和奉行的，胡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在牛津、朗文或韦伯斯特等大辞典中，宽容通常解释为对不同于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和承认。美国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视为“一种和思想及行为与众不同者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是的，社会作为一个异质共同体，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异的文化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处世态度和对事物的看法无法一致。那么，这样一群人如何在社会中共生共存呢？如果我们不是强调彼此斗争的话，宽容就是构成社会及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培养自己的宽容意识和宽容能力。

然而，20世纪中国较匮乏的精神资源之一，就是宽容。20世纪是一个比较普通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宽容则是这种“斗争哲学”的反面，由于宽容往往被误认为是软弱、妥协和不彻底，奉行这种价值观的胡适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反面典型。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生为传播自由的理念尽心尽力。晚年胡

适以“容忍与自由”为题，连续作文两篇（其中一篇是讲演），强调的是同一个主旨“容忍”。他说：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那天谈的内容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把这句话称之为“不可磨灭的格言”，进而引申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里的容忍，就是容忍异己。在胡适看来，“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当然，胡适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在论及“容忍与自由”之后，胡适致信苏雪林，再度讲述了一个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概念：“正义的火气。”胡适是很郑重地谈这个概念的，在谈论了有关《红楼梦》的一大段问题后，他笔锋一转：“现在我可以谈谈‘正义的火气’。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痛恨迷信，因此也痛恨在他看来是迷信之类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认为它们是“惑世诬民”。在一篇文章中，胡适不惜借《礼记·王制》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疑众的人。在这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因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还不对吗？这里有着“明确的是非”，所以胡适不惮以“热烈的好恶”显示自己的决绝。此时的胡适才17岁。可是，十几年后，胡适到了北大，北京政学两界的一些“卫道士”却要“杀”胡适了，理由也是《礼记·王制》中的话，所谓“学非而博……以疑众，杀”。什么叫“学非而博”？此“非”

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且又以此惑众，那就该“杀”。这里，“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于是，晚年的胡适把自己对别人和别人对自己的这两件事并作一类分析说：无论“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人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或者说，胡适的相对“宽容”和其他《新青年》同人的相对“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裂痕，它最终导致了《新青年》团队的分裂。如果说这场文化运动已经形成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那么，今天倒需要反问一下，这样的传统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文化运动的轮廓。1917 年 1 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一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之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读了信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却如同一份宣言书：“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之间的一通书信，构成了《新青年》同人团队中的一种文化对比。如果胡的主张是对话和讨论，那么陈的态度则是“不容”和“一言堂”。这是“正义的火气”的自然流露。而陈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话的主张是“对”的、“是非甚明”的。陈独秀没有考虑到，所谓“对”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种“认为”，而“认为”常常是人各认为。当你认为“对”就不容讨论，哪怕即使“对”的是你，这样的逻辑也将导致一种文化专制——“对”的专制。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看到，北大教授钱玄同披挂上阵。在发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同期《新青年》，钱玄同在“通信”中写道：“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钱玄同接过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头话表示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有理。我们今天回看“五四”时期，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就要被骂为“谬种”和“妖孽”呢？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青年》同人骂人在先、以骂人之声鸣锣开道的。你看，对方还没出阵，钱玄同就把未来的敌手给“妖魔化”了。有趣的是，钱氏不但骂以壮行色，还唯恐人家不骂，居然悬拟被骂者将“若何咒骂”。此公骂字当头，理直气壮，不就是认为自己“对”，自己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吗？

紧跟在陈独秀、钱玄同背后的还有刘半农，他与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的“双簧信”，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和《新青年》同人中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相比，胡适显然是比较理智和宽容的，同时也是相对孤立的，面对读者对

于《新青年》单方面骂人而不容许对方反驳的批评意见，胡适在《新青年》中表态说：“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团队。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主导，胡适注定要被边缘化，与胡适比较接近的蔡元培、陶孟和、李大钊等人相对宽容的兼容并包，也没有成为《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力量。因此，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1925年11月，北京知识界策划和发动打倒段祺瑞执政府的政治运动。11月29日下午，天安门广场集聚着被动员来的学生、工人约五万人。散会后，群众游行示威，其中有一部分游行示威者手执旗帜，上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蠹贼”等标语，浩浩荡荡直冲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而去。在现场，人们一边高呼“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一边以“正义的火气”点燃冲天大火，把李大钊参与创办的象征着言论自由的晨报馆烧成灰烬。事后，从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分别走出但还保持私人友谊的胡适与陈独秀论及此事，胡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独秀却在信中反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陈独秀的逻辑一以贯之，当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对”时，他就能在《新青年》中不允许别人讨论。同样，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对”，他也就不允许对方存在并消灭它。不宽容的逻辑必然导致纵火这种表达“正义的火气”的方式。

胡适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针对陈独秀的反问，他的批评可谓严厉：“你我不是曾同时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

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批评过后，胡适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慨，《新青年》没有了，新文化运动过去了，眼前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容忍的空气充满国中”。令胡适惊心的是，这个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旧势力，他们已经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这让胡适感到“悲观”，他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有人不止一次地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在举国上下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本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记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们从绩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抱着一份期待。今天，我更加期待能够有更多的人致力于铸“斗争”之剑为“宽容”之犁，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宽容尽心尽力。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当年胡适所做的那样。

邵建

作者是南京晓庄师范学院教授，著名人文学者。本文已经收入《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本文收入本书时，曾对若干处作了删节和修改。

目 录

序 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	邵 建 (1)
-------------------	---------

绪论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经历	(1)
-------------------------	-----

第一章 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	(7)
-----------------------	-----

一、启蒙先驱的“一知半解”	(8)
---------------------	-----

二、艰苦卓绝的报刊宣传	(11)
-------------------	------

三、组建岳王会的革命活动	(14)
--------------------	------

四、辛亥革命后的从政经历	(15)
--------------------	------

五、与章士钊的再度合作	(16)
-------------------	------

六、《爱国心与自觉心》	(20)
-------------------	------

七、陈独秀创办《新青年》	(22)
--------------------	------

八、《新青年》同人的国家观	(24)
---------------------	------

第二章 蔡元培对陈独秀的迎来送往	(30)
------------------------	------

一、蔡元培诚聘陈独秀	(31)
------------------	------

二、以德治校的进德会	(34)
------------------	------

三、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36)
------------------	------

四、对于陈独秀的变相免职	(41)
--------------------	------

五、北大评议会的制度缺失	(43)
--------------------	------

第三章 《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48)
-----------------------	------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49)
-------------------	------

二、《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	(52)
-----------------------	------

三、《新青年》的“复活”	(55)
--------------------	------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与分裂	(59)
五、《新青年》同人的利益分化	(62)
六、“金字招牌”的内部争夺	(65)
 第四章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75)
一、六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新青年》	(76)
二、胡适与罗家伦的历史记录	(83)
三、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	(87)
 第五章 《新青年》编辑高一涵	(96)
一、《新青年》的创刊元老	(97)
二、“甲寅派”的重要写手	(101)
三、参与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	(106)
四、胡适与高一涵的共同“努力”	(109)
五、胡适对高一涵私德不佳表现的宽容	(110)
六、高一涵的历史回忆	(112)
 第六章 周氏兄弟与《新青年》	(119)
一、周作人笔下的《新青年》	(120)
二、鲁迅笔下的《新青年》	(122)
三、鲁迅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	(126)
四、周作人的“托名”鲁迅	(131)
五、鲁迅加盟《新青年》的思想原点	(135)
 第七章 钱玄同与胡适的全程合作	(141)
一、钱玄同与《新青年》	(142)
二、钱玄同与胡适的精神互动	(146)
三、钱玄同的“小批评大捧场”	(152)
四、胡适与钱玄同的意见分歧	(156)

五、钱玄同的追悔反思	(159)
六、钱玄同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普及功不可没	(162)
第八章 刘半农与胡适的公私交往	(171)
一、“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	(172)
二、《新青年》的四大“台柱”	(173)
三、淡出《新青年》的刘半农	(177)
四、刘半农与胡适的后续交往	(182)
五、刘半农与胡适合作的善始善终	(186)
六、刘半农死后的是是非非	(189)
第九章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之争	(196)
一、“易卜生号”与“易卜生主义”	(197)
二、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	(201)
三、钱玄同挑起的戏剧论争	(203)
四、“戏剧改良专号”的新旧之争	(207)
五、封戏馆、废旧戏的极端话语	(211)
六、鲁迅笔下的宋春舫和梅兰芳	(215)
第十章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221)
一、“某籍某系”的由来	(222)
二、鲁迅笔下的“包围新论”	(225)
三、“包围”失败的周作人	(226)
四、“包围”蔡元培的汤尔和与沈尹默	(233)
五、蔡元培与胡适、傅斯年的良性合作	(238)
第十一章 傅斯年与周作人的公私恩怨	(244)
一、周作人的“反复颠倒”	(245)
二、《新青年》时代的傅斯年	(248)

三、傅斯年与周氏兄弟	(252)
------------------	-------

四、从新潮社到北新书局	(257)
-------------------	-------

第十二章 周作人的精神追求与路径迷失

(264)

一、周作人的造谣说谎	(265)
------------------	-------

二、忠实原著的“直译的方法”	(269)
----------------------	-------

三、人道主义的新宗教	(272)
------------------	-------

四、《小河》中的劣败心理	(276)
--------------------	-------

五、天堂净土的“新村”	(279)
-------------------	-------

六、“新村”运动的路径迷失	(281)
---------------------	-------

七、《新青年》同人的路线图	(284)
---------------------	-------

绪论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经历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改由北京大学的6名教授轮流编辑,从而改变了此前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性刊物的小格局,以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全国性同人刊物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和读者面前。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

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共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①

比起胡适的事后回忆,刚刚到北京大学担任预科教授的刘半农,在1917年10月16日致钱玄同信中,更加真切地描述了四大“台柱”齐心协力“复活”《新青年》的历史现场:

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

先生说的积极进行,又从这里面说出“造新洋房”的建设,

和“打鸡骂狗”的破坏两种方法来，都与我的意思吻合；虽然这里面千头万绪，主张各有进出，那最大的目标，想来非但你我相同，连适之独秀，亦必一致赞成。然前天适之说，“独秀近来颇不起劲”，不知是何道理？

先生说“本是个顽固党”。我说我们这班人，大家都是“半路出家”，脑筋中已受了许多旧文学的毒。——即如我，国学虽少研究，在一九一七年之前，心中何尝不想做古文家，遇到几位前辈先生，何尝不以古文家相助；先生试取《新青年》前后所登各稿比较参观之，即可得其改变之轨辙。——故现在自己洗刷自己之外，还要替一般同受此毒者洗刷，更要大大的用些加波力克酸，把未受毒的清白脑筋好好预防，不使毒菌侵害进去。这种事，说是容易，做就很难；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②

“加波力克酸”即化学中的硫酸 (Sulphuric acid)。在刘半农的心目中，“《新青年》前后所登各稿”，虽然已经初步表现出“改变之轨辙”，但是还改良得远远不够。作为“半路出家”和“脑筋中已受了许多旧文学的毒”的大多数撰稿人，都需要用强硫酸来“自己洗刷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而“还要替一般同受此毒者洗刷”。这就是《新青年》的“文学改良”所要追求的“思想革命”的理想效果。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刘半农透露了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在《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近来颇不起劲”的情况下，是更加年轻的刘半农、钱玄同、胡适迎难而上，推动陈独秀“再多请名角帮忙”组成一个主要由北大教授加盟的同人团队，从而实现了《新青年》杂志改头换面后重新上路的“复活”。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关于《新青年》的“复活”，当时还没有正式加盟这个同人团队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也在1918年1月4日致许寿裳信中介绍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